

# 中俄印三角关系： 理论、形成条件及其变迁\*

涂志明

**【内容提要】** 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战略三角，还是冷战后的中俄印三角关系，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内涵决定了三角理论模式发展趋势。以迪特默三角模型及其构成条件为基础，结合冷战以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可以发现三角关系由于问题领域的不同而具有非零和博弈特征，同时三角关系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内有关联性。研究冷战后中俄印三角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不难发现，三角关系的问题并不在于概念本身如何界定，而是取决于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俄印三角关系，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阐释三者间关系。

**【关键词】** 三角关系 大国关系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作者简介】** 涂志明，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早在冷战时期，“三角关系”就已经成为学界研究大国关系的重要视角之一，比较典型的要数中美苏三角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三角关系依然是分析大国关系互动机理的钥匙，然而传统的“三角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缺乏一种严格而清晰的概念界定，很多研究忽略了原有模型的前提条件，其分析方法陷入简单机械的窠臼。

## 一 传统三角关系的模型及其形成条件

### （一）冷战时期的传统三角关系

从特定时代背景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三角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

---

\*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现代国家与国际秩序”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基金项目支持（项目编号：CCPDS - FudanNDKT16014）。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国际政治中三个行为体之间，尤其是大国间彼此互动的特殊关系。最早论述三角关系的文献当属马丁·怀特的《国家间体系》。怀特认为，三角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体系或外交共同体的存在；其二，三个大国在国家体系内相对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优势，同时三者间每个国家都拥有足够的力量，在另外两个国家缺失的时候主导世界或建立单一君主政体；其三，大国间相互猜忌、紧张和敌对，使得任何两国都无法暂时形成联盟反对第三者<sup>①</sup>。

但在现实中，三角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使上述三个方面很难契合，更重要的是国际体系的先决条件，即“外交沟通的规范性与文化的同质亦不容忽视性”<sup>②</sup>。同时，怀特以体育竞赛的形式将三角关系中行为体互动分为四个类型：其一，决战型或世界冠军型，即一国击败另外两国，其他两国依次排名；其二，半决赛型，即两国联合击败第三方，而这两国要么势均力敌，要么是较强的胜利者对抗进入体系的新挑战者；其三，首轮比赛型，即三大国因竞争而精疲力竭而被外来者征服；其四，预赛型，结成紧密伙伴关系的两国无法与第三者发生冲突，三角关系消失<sup>③</sup>。可以看出，怀特的模型尽管涵盖了行为体的动态式演进，却囿于时代的局限性过于强调三角关系的对抗性特征，忽略了三角关系存在的共生性。

另外，洛厄尔·迪特默试图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战略三角关系。他认为，三角关系是“三个博弈者之间的交易”<sup>④</sup>。这类博弈与互动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三人共处型，三个博弈者之间的对称性友好关系；罗曼蒂克型，战略中心一方“pivot”与另外两个求爱方“suitors”分别关系良好，而另外两个求爱者之间呈现敌对态势；稳定婚姻型，由两方的友好关系和各自与第三者之间的敌对关系构成。后来的学者还补充了第四种模式——单位否决型，即每一个行为体与其他两行为体的关系都比较消极，处于对立之中<sup>⑤</sup>。

①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74.

② Ibid, p. 175.

③ Ibid, p. 179.

④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 – 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 1981, pp. 486 – 490.

⑤ 事实上，在迪特默的《The Strategic Triangle》一文中只列举了前面三种互动模式，后面的单位否决模型可能是后来学者补充进去的。而提到单位否决模型的学者有陈志敏的《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刘卫东的《新世纪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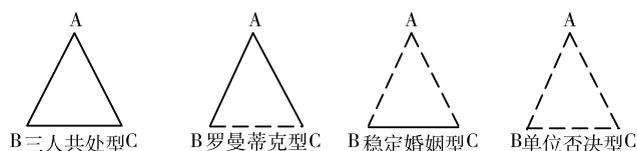


图1 三角关系的基本模型

注：图中实线表示积极关系，虚线表示消极或对抗关系。事实上，A、B、C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现绝对的友好或对立态势，以稳定婚姻模型为例，也有可能呈现A、B（或A、C）保持友好关系，而与C或B呈现敌对关系，三角关系的发展和演变本身就因时代背景和特定环境的不同而处于动态性的变化过程。

## （二）传统三角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

三角关系要求三个行为体间的关系互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至于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化都对第三方的利益构成重大影响。三者中任何一方采取的针对另一方的外交政策都可能受到和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和中国被称为“战略大三角”，三者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不考虑另外两方而采取单独行为。对传统三角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给予阐释，不仅有助于了解三角关系形成的外部因素，还有助于厘清全球化背景下新三角关系形成的原因，为分析中俄印三角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传统三角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前提作出决策。首先，单个行为体权力的加强会让另外两者感到压力，使其中一方会寻求与另一方的密切关系来应对第三方的威胁。1950年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过程中与苏联正式结为同盟关系。从苏联角度看，与中国结盟也是为了应对北约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所造成的安全威胁。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和越南战争泥潭，加上西欧与日本盟友的相对崛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在美苏竞争中处于守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具体措施有：加强同西欧、日本的关系；结束越南战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谋求与苏联竞争态势的“缓和”。

其次，决定三角格局中各方行为体外交政策方向的内外因素是构成三角关系模式及其变化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每一种模式中处于不同（有利或不利）地位的行为体都会适时改变政策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边倒”与苏联结盟，60年代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70年代中国转向

“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与美国和解，以及80年代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紧张关系的缓和，都说明单个国家行为体内外环境及在三角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

第三，即使三个行为体没有拥有完全对等的战略权力，实力最弱的一方也必须被其他两者视作合法且独立自由的行为体。按照迪特默的界定，该行为体是基于理性选择而进行博弈互动。回顾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战略三角的形成是以两个阵营的“极”为基础。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的地位受到开罗会议肯定，这种对国家行为体地位合法性的认可也使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最后，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认识到三角关系模式的战略特征。尽管每组博弈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必须从属于与三角关系中其他成员的关键性博弈互动<sup>①</sup>。

因此，基于三角关系的前提条件之分析可以看出，迪特默的三角关系模型具备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并暗含着一定的均势观念于其中。在传统的均势思想中，即使三角关系没有形成联盟也能产生均衡。也就是说，当A和B的关系发展不足，那么A或许能在不直接明确与C结盟的情况下加强与C的双边关系，或宣布放弃与B的结盟关系<sup>②</sup>。

## 二 冷战后三角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前提条件： 以中俄印三角关系为例

### （一）冷战后三角关系构成的新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朝多极化方向发展。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俄罗斯沦为地区大国。经过90年代休克疗法的震荡期后，21世纪的俄罗斯国家整体实力逐渐复苏，外交政策逐步回归大国行列。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主要发展中国家都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实力的提升，在国际舞台上新兴大国数量与日俱增。除了冷战时期的英法德日等老牌强国外，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

---

<sup>①</sup>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 – Theoretical Analysis” .

<sup>②</sup> Danielle F. S. Cohen, “Retracing the Triangle: China’s Strategic Perceptions of Japan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umber 2 – 2005, p. 7.

中实现和平发展，印度、南非以及巴西都在同一时间实现了在地区范围内的实力增长。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权力消长和格局变化的明显标志<sup>①</sup>。

首先，各行为体间互动关系呈现出相互依赖性。与冷战时期的三角关系不同，冷战后的三角关系不存在双边关系绝对性断层现象，即两个国家不会陷入全面的外交僵局。全球化背景下的问题议程多元化及其外溢效应使任何两个博弈者之间都很难出现完全对立的局面，同时，经济、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关联性也使三角关系呈现出相对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三角关系不存在绝对的零和博弈，因此，有必要对迪特默三角模型进行修正。

其次，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有所改变。在传统的三角关系中，决定成员地位之权力基础是军事实力。而在新战略三角关系中，军事力量固然很重要，但其重要性已经有所降低，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的重要性则大大提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增强综合实力必备条件的全球化时代，旧式的军事强国理念已经不符合发展潮流。

第三，由国际行为体多极化导致不同地区间多重三角关系的共存性与关联性更加突出。例如，欧洲地区存在俄美欧三角关系<sup>②</sup>，亚太地区则存在中美俄、中美日三角关系，南亚地区存在中印巴、中俄印三角关系。这些三角关系格局的存在大体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并摆脱两极格局的压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sup>③</sup>。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多重三边关系的关联性，如欧美俄三边关系变化某种意义上也会影响中美俄、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此外，安全问题的外溢效应和问题领域的关联性也会引起诸多行为体关系的变迁。这就涉及对迪特默理论的第二次修正，即某个三角关系会产生“迁移”效应，会影响其他的三角关系态势，进而衍生出多重三角关系的关联性（见图2）。

<sup>①</sup>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sup>②</sup> 事实上，在审视三角关系的过程中，就迪特默的三角关系理论还有第三次改造，即关于行为体的改造，即将三角关系中的欧盟看作是既包括了欧盟整体，也包括了欧盟成员国的行为体，其中有代表欧盟整体发挥对外互动角色的委员会/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这是欧盟自身的独特性所在，但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sup>③</sup> 行为体间的权力制衡是构成这些三角关系的基本条件，但是不同行为体构成的三角关系的具体内涵因地缘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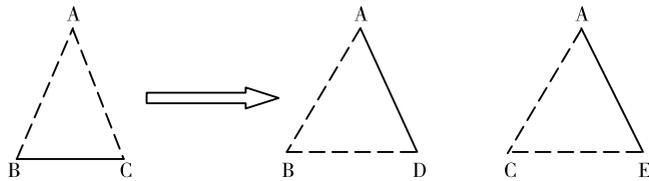


图2 居于劣势地位的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改善关系造成多重三角关系格局并存

注：A 由于在三角关系中受到 B、C 的抑制而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寻求与其他行为体 D、E 改善关系来获得支持，并扭转 ABC 三角中的孤立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多重三角关系并存的格局。

此例仅仅说明各方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式的变化之中，A、B、C 三者之间的任何一方处于劣势地位，都会通过与其他行为体改善关系而形成多重三角关系并存的态势。

第四，国际问题领域的多元化使传统三角关系格局中安全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同的国家基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可以通过“议程设置与问题的非对称性依赖”作为引导问题解决的手段<sup>①</sup>。

冷战后三角关系与传统三角关系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三个行为体并没有完全按照迪特默三角理论设定的前提条件进行互动。一方面，任何三个行为体的经济、安全相互依赖性增强，合作的空间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尽管三个行为体之间可能存在地缘竞争关系，但是在某些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抑制了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如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议题。

## （二）冷战后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变迁

针对上述迪特默三角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行的两次修正之后，我们有必要梳理三国互动的历史进程，以便较为清晰地了解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发展态势，进而理解三角格局中行为体变迁的形成条件。当然，我们在审视中俄印战略三角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是，新战略三角并非完全符合迪特默的几种模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现实弱化了传统模式的恶性竞争效应。

理论上，战略三角关系可以通过观察三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确定。90 年代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亚洲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原先被两极格局压抑的国家间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中苏（俄）关系方面，1989 年 5 月中苏在北京举行会谈，两国政府宣布双边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以后，中俄关系继续向前推

<sup>①</sup>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earson, 2011, pp. 24 - 28.

进，但由于独立初期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在对华关系方面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俄印关系同样如此，俄罗斯在印度关注的核利用与克什米尔问题上追随美国，拒绝向印度提供用于民用空间计划的低温技术。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加上俄国内对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批评，以1996年俄外长普里马科夫上台为起点，俄罗斯的对华、对印关系开始出现实质性进展，这标志着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开始。

1996年，俄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两国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中俄在莫斯科举行峰会，双方在《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确立了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共同目标。普京上台后，对中俄关系发展更加重视。2000年7月，普京首次访华，并在会后发布的《北京宣言》中对西方国家在“反导条约”上的退步表示关注。2001年，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意愿和决心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发展联合声明，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2016年6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签署了三份政治文件<sup>①</sup>。同时，两国还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在俄印关系方面，2000年10月和2002年12月普京总统先后两次访问印度。2002年访印期间，俄印签署了战略宣言，同意在战略伙伴关系层面举行年度峰会。同时，俄印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在新的合作安全秩序基础上建立多极化世界<sup>②</sup>。2003年访俄期间，瓦杰帕伊指出，印俄之间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强调两国友好关系在变化的世界舞台上会成为一支稳定的力量<sup>③</sup>，宣称印俄两国在反对“单边主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sup>④</sup>。2009年，印度与俄罗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2015年12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参加第16次俄印双边峰会。峰会期间，双方共签署了16项协议，具体内容涉及军事合作、

① 这三份文件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② Thomas Ambrosio, "The Third Side? The Multipolar Strategic Triangle and the Sino - Indian Rapprochement", *Comparative Strategy*, 24, 2005, p. 401.

③ Сурендра Синг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Индией в рамках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сценария//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8 (2013 6), г. 1234.

④ Joint Statement on the Results of the Visi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Atal Bihari Vajpayee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archive.mid.ru//brp\\_4.nsf/0/9C03D8D38E2CF37A43256DDE005B5432](http://archive.mid.ru//brp_4.nsf/0/9C03D8D38E2CF37A43256DDE005B5432)

跨国投资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sup>①</sup>。

当然，中俄、俄印关系推进的同时，中印关系也打破了冷战时期对抗的阴霾，出现了转折。1988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标志着中印关系出现新的转折点。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在联合宣言中强调要在“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发展中印“新型关系”<sup>②</sup>。这一时期也正是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单独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期，中俄、俄印和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事实上逐渐转向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调整。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并加入到印度主导的南亚地区合作协会，与印度就地区合作问题开展交流。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受邀访华，双方就经贸、外交合作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中方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沟通。大体上，中印关系的发展并不如俄印、中俄关系发展得那样顺利，主要原因是中印两国依旧存在边界问题。然而由于双方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合作的需要，中印关系的发展总体上会保持积极稳定的势头。

尽管这三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为中俄印三角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是迪特默模型中蕴含的权力制衡特征却不会消失，只是这种特征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了新的变迁，恶性竞争效应逐步让位于良性竞合关系。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出于俄印对中国强势发展的防范，另一方面，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介入也是推动该三角关系形成的关键因素。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借反恐之名，行地缘战略部署之实，加强对阿富汗与中亚地区渗透，严重威胁到中俄印的地缘安全。毫无疑问，三国都反对美国霸权，认为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和外交影响不符合自身利益。然而，美国全球战略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中俄印战略三角即使反对美国单边政策，也不会让这种对单边主义的反对行为有损于和美国的关系。应该说，这就决定了中俄印战略三角的形成中无法摆脱美国因素的存在。

### （三）中俄印战略三角形成条件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造就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新

---

<sup>①</sup> Sumit Kumar, *New Momentum for India - Russia Relations?*, January 03,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1/new-momentum-for-india-russia-relations/>

<sup>②</sup> 《中国和印度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0625/11494489.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0625/11494489.html)

变化：首先，大国间的安全竞争有所缓和，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主要矛盾因问题议程的多元化而受到压制。尽管中美、中印、中日也会出现磕磕碰碰的现象，但地区整体态势比较稳定；其次，中俄印三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以及相应的周边安全事态上，特别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气候环境问题成为共同的关注焦点；再次，三国各自加快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增长，进一步强化了权力格局的多极化态势；最后，中俄印三国当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强。虽然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总体上仍呈现增长的态势，2016年GDP增速为6.7%。然而，美国仍是冷战结束后的唯一超级大国，拥有强大的经济活力、全球军事投射能力以及雄厚的软实力。但近年来，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收缩，尽管它仍稳居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并在其他地区保持强大影响力，但却无法在全球运用自如。

早在1998年12月，俄总理普里马科夫访问印度时就提议建立中俄印战略三角，制衡美国不受遏制的权力与影响<sup>①</sup>。俄罗斯的这一外交倡议是在俄罗斯与西方蜜月关系结束并转向独立外交政策时期提出来的。1997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这一时期恰恰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俄美就北约东扩问题产生僵局的阶段。2002年9月，中俄印三国外长首次进行会晤。2005年6月，中俄印三国外长举行第四次非正式会晤。在三国发表的最后公报中，中俄印外长重申了在21世纪全球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并强调了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要构建一个基于国际法、相互尊重、合作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sup>②</sup>。2015年2月，中俄印三国外长在北京举行第13次会晤，三方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还突出了构建多赢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三国还把中东与乌克兰危机等地区问题纳入到协商范畴中，并强调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sup>③</sup>。基于以上事实可知，首先，凸显了前文对迪特默模型修正的重要性，即冷战后形成的中俄印三角关系不存在绝对的零和博弈性质；其次，结合中俄印三国

<sup>①</sup> Munazza Nargis Kazmi, "Future Prospects of Russia - China - India Triangle: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p. 225.

<sup>②</sup> PTI News Agency, 0732 gmt, 2 June 2005, reproduced as "Text of Joint Communiqué of Indian, Russian, Chinese Ministerial Meeting," in BBCMIR, 2 June 2005.

<sup>③</sup>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13th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2649\\_665393/t1233638.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2649_665393/t1233638.shtml)

举行会晤的时间背景以及对多极化的反复重申可以发现，当下诸多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离不开美国的影响，三角关系亦是如此；第三，由中俄印反复表达的多极化观点来看，三角关系的构成是一项寻求遏制美国权势与影响的大战略，即使其目标是防御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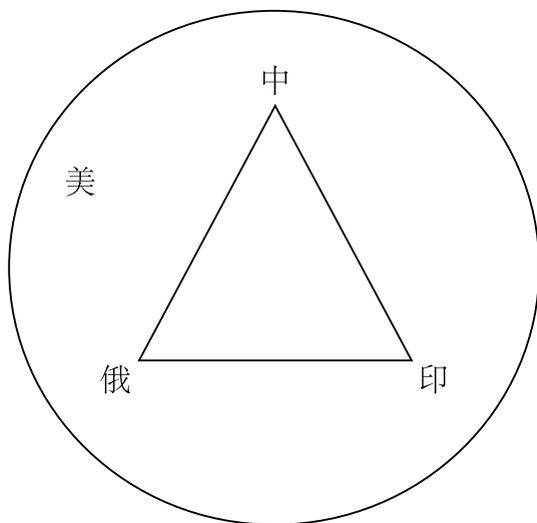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阴影”下的中俄印三角关系

从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影响范围来看，印度的地缘视野决定了印俄、中印只能在南亚以及部分邻近地区产生影响，而在超出这些地区之外的中东、欧洲以及东亚地区，中国与俄罗斯则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中俄印三角只具有地区意义，大国之间的竞争使得它们竭力获取地区影响，改善他们的战略环境，抵消美国单边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美国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及实力优势，在涉及与中俄印有关的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一种对其有利的“介入战略”或者是“选择性战略”<sup>①</sup>，进而在三者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事实上，将当前俄罗斯与欧盟、美国在欧洲地区进行三角互动中面临的劣势加以考虑，俄罗斯加强与中印的关系意图在于扭转其外交环境中的不利态势。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印关系（尤其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能会对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但却有可能会影响中美日或中美俄三边关

<sup>①</sup>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1 - 171, pp. 223 - 248.

系的发展态势，从而产生外溢效应。

所以，综合中俄印三角关系的总体发展态势，结合对迪特默模型的修正，当前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形成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对霸权国单边行径的遏制是构成中俄印三国靠近的一个“外力”。美国的欧亚战略给中俄印三国的周边安全构成重要挑战，同时，作为冷战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中俄印三角关系背后并不仅是遏制美国的单极霸权，而是这一现象反映出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来看，就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博弈。这一现象在21世纪后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变得愈加明显。其二，国际问题议程呈多元化趋势。这主要涉及反恐和经济两个方面：反恐方面，三国都面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特别是紧邻中俄印三国的阿富汗更是地区安全关注的重点；经济方面，三国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都是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拥有促进经济增长和能源供需的合作基础，同时，彼此都在全球发展和环境变化问题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其三，三角关系中的权力制衡依旧发挥着效用。中国的崛起给亚太和世界权力格局将带来重大变化，也推动了印度亚洲政策的发展。在印度与美、俄的联合声明中，印度欢迎扩大东亚峰会，将美国和俄罗斯纳入其中，并强调维持地区机制的“公开与包容”的重要性<sup>①</sup>。而且，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战略三角中俄罗斯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只要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与地位继续提高，那么俄罗斯在三角关系中的作用就可能沦为印度拉拢、制衡中国的对象，但是相比传统三角格局下的零和博弈来看，中俄印三角关系可以说属于彼此间的“弱势权力制衡关系”。

#### （四）“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俄印关系

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与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南、北、中三条线路，其中南线经东南亚与印度的加尔各答对接，而北线则借道俄罗斯到达欧洲。

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上两个重要经济体。该倡议的实现不

<sup>①</sup> C. Raja Mohan,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s Emerging Strategic Triangle*, Strategic Snapshots, MacArthur Foundation, February 2011, p. 3.

仅将使三国的经济发展实现进一步融合，还有助于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带动俄罗斯经济增长<sup>①</sup>。在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和西方经济制裁尚不松动情况下，俄罗斯选择战略重心东移，积极向中印靠拢。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尽管印度并没有对该计划表示反对，但却持有谨慎态度。印度不少学者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对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构成威胁<sup>②</sup>。这一方面与中印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巴关系的发展有关。为此，2014年6月，印度政府推出“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旨在以印度洋为核心，逐步向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区拓展<sup>③</sup>。从长远来看，中印的合作要大于竞争，双方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安全与环境维护、地区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2015年5月，在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印可以就“一带一路”、亚投行与印度的“东进政策”进行协调。莫迪表示，希望密切与中方在亚投行内的合作，加强在多领域内沟通，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sup>④</sup>。

总体上，如果将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发展在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俄印都曾对中方的战略规划产生忧虑，但是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三国间合作的决心。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发展与安全等问题的共生性，决定了中俄印战略三角的非零和博弈特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发展将一定程度影响亚太地区格局，缓解中国在东亚地区面对的战略压力。在中国提出该倡议的背景下，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将取决于中国政策的演变，尤其是在涉及俄印敏感的势力范围层面。此外，尽管这个三角关系是在中国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但问题议程关联性使各方不会过度寻求遏制对方的政策，避免产生严重的（武力）对抗，在可能产生冲突时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这也突破了迪特默理论三种模型分类的框架，即共同利益的观念性因素和严格的客观物质利益塑造了中俄印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① 姜振军：《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与双边经贸合作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陈菲：《“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

③ Sachin Parashar,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oeuvre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Sep 16,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arendra-Modis-Mausam-manoeuve-to-check-Chinas-maritime-might/articleshow/42562085.cms>

④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14/c1024-27002350.html>

### 三 中俄印三角关系的管理

根据前述对迪特默模型的修正以及冷战后中俄印三角关系形成的背景与条件的变化，阐释中俄印三角关系的起源及其发展需要基于三个方面，即推动中俄印接近的地缘战略需要；决定各自外交政策方向的因素；美国对三者的政策影响。但是战略三角的复杂多变性使得如何管理三者间关系成为中国战略谋划的重要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中俄印三角关系的机制化管理。当前，中俄印三角关系的机制化日趋成熟，三方共处模式成为中俄印三者的基本形态。虽然三角关系的制衡性不可避免，但是国际问题议程的关联性使得中俄印三国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并对地区与国际事务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截至 2015 年 2 月，中俄印三国外长共举行了 13 次会晤，三角关系的机制化效应初步具备，所以，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三方合作是主流，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有助于增加三方在各问题领域内的沟通与协调。

其次，加强政治互信是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基础。历史地看，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发展也一直比较敏感。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产生的经济外溢效应将强化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该倡议还将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威胁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些都会从深层次制约三方的合作，需要中俄印三国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沟通与互信。

再者，处理好美国因素是中俄印面临的挑战。美国依旧是中俄印关系中的关键因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05 年出台的报告《描绘全球未来》（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中指出，“中国和印度作为新的全球博弈者的崛起将会给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带来变化”<sup>①</sup>。同时，美国、印度又对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权力挑战颇为防范。考虑到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主导或强势地位，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可能性较低，实施有效的平衡政策较为困难。对于印度而言，需要考虑的是，不同的地缘条件和战略需求决定了印度联美制华的局限性，印度需要在保持对美关系友

<sup>①</sup> Ananya Chatterjee, “India – China – United States: The Post – Cold War Evolution of a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al Perspectives* 2011, volume 5 (3), p. 89.

好的同时不要打乱中印之间的平衡。所以，作为美国眼中的潜在竞争者，中国需要更好地处理国家发展对美国权力构成的挑战，防止美方出于战略需要联印制华。

最后，中俄印对回归世界大国行列的追求会成为三边协调的难点。中印对成为世界大国的渴望以及俄罗斯对重圆“大国梦”的期望成为三角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三国都认为彼此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满足于扮演国际社会的小伙伴角色。三国国内的政治文化使得它们会继续寻求重构国际体系的政策，而不顾美国的政策反应。这并不是说三个国家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挑战国，而是说它们不满足于只成为一个中等强国<sup>①</sup>。同时为了遏制国际体系中竞争对手地位的提升和权力的增长，美国会寻求与三者中单个国家发展积极的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中俄印战略三角的逻辑并不完全是传统的对抗式地缘政治理念，而是观念性因素和客观物质利益塑造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议程的关联性将为三者建构一套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相容的国内和国际机制<sup>②</sup>。相反，如果缺乏共有的价值观和相容的机制，三角关系则有可能在危机或极度紧张状态下失衡。

(责任编辑 王晨星)

---

<sup>①</sup> Thomas Ambrosio, *The Third Side? The Multipolar Strategic Triangle and the Sino - Indian Rapprochement*, *Comparative Strategy*, 24, 2005, p. 409.

<sup>②</sup> 相容的国内和国际机制的形成前提在于博弈三方需要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对三角关系的构成及其发展演变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战略三角的维持会推动各方形成相似的内外决策机制。